

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语文

教育论集

吕叔湘

论集

顾黄初 李杏保 主编

刘国盈：关于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 1949

董纯才：改革我们的中学国文教学 1950

潘开沛：对国文教学的几点意见 1950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1951

徐世荣：中等学校语文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1952

周振甫：阅读作品要注意时代背景 1953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惯 1963

朱作仁 小学低年级三种识字测定目标的

比较研究 1966

朱棣华 反对烦琐哲学坚持精讲多练 1977

叶圣陶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

教学 1978

段力佩 谈谈语言教材 1979

包忠文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1980

张志公 语文学科的现代化问题 1981

魏书生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1981

蔡澄清 重在点拨 1982

韩雪屏等 应当建立一门阅读学 1982

张翼健 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

体会 1983

欧阳代娜 初中语文能力过关问题探索

1984

钱梦龙 主『四式』语文导读法探索

1985

顾黄初 李杏保 论语文教育研究的『三个

面向』 1986

倪文锦 试论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 1987

顾黄初 语文教学要由近生活 1987

佟士凡 系统科学与语文教学 1988

张厚感 语文教材的『种模式』 1989

阎立钦 关于建立语文教育学学科体系的

思考 1990

二十世纪 后期

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主编 顾黄初
李杏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顾黄初,李杏保主编.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ISBN 7-5408-3470-6

I.二… II.①顾…②李… III.汉语—教学研究—
中国—文集 IV.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8971 号

责任编辑:吴晓桐
装帧设计:何一兵
版式设计:王 凌
责任印制:史茂露

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论文集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成都勤慧照排公司照排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制
(成都市人民北路 16 号 邮政编码:610081)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90 字数 103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08-3470-6/G·3260 定价:180.00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3191287



顾黄初：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 1987

佟士凡：系统科学与语文教学 1988

张厚感：语文教材的三种模式 1989

阎立钦：关于建立语文教材新体系的问题 1990

1990

李吉林：情境教学的

潘仲茗：对语文课程

吴立岗：儿童语言交

1993

于漪：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主

1994

朱绍禹：语文教材文化的建设和理论研究

陈日亮：得法养习 历练通文 1996

章熊：我理想中的教材和教法 1997

陶本一：语文教育和语言素质 1997

孙光萱：论中学语文教学的两个误区 1997



A7765/09

冰 心：漫谈语文的教与学 1959

陈望道：语文课的『文』『道』问题 1961

文汇报社论：试论语文教学

叶圣陶：『教师下水』

吴天石：加强语文基

1962

吕叔湘：关于语文

颜振遥：教育阅读

1963

朱作仁：小学低年级

研究 1966

朱棣华：反对烦琐哲学 坚持材料多练 1977

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 1978

段力佩：谈谈语文教材 1979

包忠文：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1980

序

刘国云

顾黄初、李杏保两位先生合编的《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即将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件事去年春上就听黄初说起过，这次寄来了全书的目录和卷首编者写的《引论》，觉得史料颇为详备，共收建国以来重要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一百五六十篇，依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从1949起直到1999年为止，整整半个世纪，对研究当代语文教育史确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由“后期”自然要想到“前期”。

据黄初说，此书原拟的书名是《中国国文、国语、语文教育论集》，当写信恭请吕叔湘先生题写书名时，吕老不但欣然答应，还建议把书名改成《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从1900年到1949年建国前将近50年，是“前期”；从1949年建国后到1999年整整50年，是“后期”。书名一改，气魄固然大了，历史的脉络也清楚了。吕老这一建议，对此书来说，可算得上是点睛之笔。更为感人的是，吕老在题签时写到“前期”二字，特地预先写了10多个“后”字，他在信上说：“前期”的书名写好了，想到再过10年一定要再编一部“后期”。到那时，我也许已

不在人世，即使幸而还健在，怕腕力已衰，不如现在趁早把“后”字一起写好，大家都省事。黄初口述，大意如此。我相信这是真的，符合吕老一贯对后辈的关爱和扶持，这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确是一段令人难忘、发人深省的佳话。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后期的50年当然是前期50年在新的政治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发展。期间尽管有反复，有曲折，甚至受过伤害，但总的趋势是在变化，在前进，在革新。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和未来的语文教育改革都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记得去年初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在昆明联合召开一个关于语文课程教材建设的小型调研会，应邀参加的都是中小学教材的审定委员和中学语文学科的审查委员。当议论到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那场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现状的大讨论时，大家颇多感叹。与会者都是亲自经历了建国后50年语文教育的风风雨雨的，对讨论中那些抨击中国语文教育“扼杀人性”、“误尽苍生”、“失去灵魂”的鼓噪声，觉得与实际距离太远。至于后来从《忧思》到《审视》的先后出版，便发现某些人的论调越来越离谱，只是把语文教育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真正的用意恐怕不在此。当然，那只是很少的一部人；多数批评语文教育积弊的人，还是真心希望语文教育通过改革，在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文素质方面发挥它应有的育人功能，只是因为他们对建国以来50年语文教育的风雨历程知之甚少，所以议论中难免有偏颇，有偏激之词。

当与会者谈到有关文学教育必须加强的时候，自然就

想到 50 年代试行汉语、文学分科的改革实践。大家认为当年的分科改革，是我国自 20 世纪初废科举、兴新学、语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在中学里首次施行系统的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尽管后来因故中止，但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那套由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指导，由著名现代作家吴伯箫、文学史家张毕来、古典文学专家冯钟芸、向锦江等直接参与编辑，又经茅盾、老舍、臧克家、萧三等提供过意见的初、高中文学课本，是近百年来中学语文学科中编得最好的教科书之一，凡是教过或学过这套课本的师生，至今都深情地怀恋着它。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套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凡涉及到文学教育的，都从当年那套文学课本中吸取养料，并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加以补充和发展。说建国后几十年来的语文教材教法，是被以“三老”（指叶圣陶、吕叔湘和张志公）为代表的“语言派”所控制，现在应当换一种力量，那就是让“文学派”或者“现代文学派”来支配，岂不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梦呓！

建国以后 50 年的语文教育发展历史，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这对建设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语文教育新体系，形成新世纪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十分必要。依我看，做好这件事，需要一定必备条件：一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教育观点，这是前提；二是足够的史料准备，这是基础；三是一批有志于此而又有敏锐的历史鉴别力的专家、学者，这是关键。

记得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中国语文》编辑部曾为推动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编过

一部题为《语文教学问题》的论文集，作为“中国语文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此书的最后还附有1978年3月至10月的报刊中有关语文教学问题文章篇目索引。研究会成立以后，又曾编辑出版过一些语文教育研究的论文集，如张定远编的《中学语文教学论集》《阅读教学论集》《作文教学论集》《语法修辞逻辑教学论集》等。我也曾经与陈哲文先生编过《语文教学在前进》，那是全国中语会第三次年会的论文集；还编过我称之为“聚英汇粹”的书，名为《我和语文教学》，是当时一些著名语文教育家、优秀语文教师、经验丰富的语文教科书老编辑回忆往事、展望未来的十分精彩的论文集。当时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把一个时期内语文教育研究的主要成果，用《论文集》的形式保留下来，让后继者们能看到中国语文教学改革和发展的一串又一串脚印。我们当时做的不过是一种阶段性的收集和整理，远没有黄初和杏保二位先生纵览半个世纪，按历史发展线索，在每个阶段语文教育研究论文的众多上品中再选精品，显示出语文教育史家的魄力和眼力。可是我们也有点沾沾自喜，因为毕竟为这部宏伟的史料集，铺过几块砖，添过几片瓦。

“后期”入选论文的作者中，绝大多数我都熟识。有些入选的论文，未必是作者自己认为最满意、最能全面反映自己研究多年而已相当成熟的成果。这也难怪，就作者个人而言，最能反映自己研究水平的代表作也许是发表在90年代中期乃至后期的；而从史料编辑的要求而言，选文标准恐怕更多地是要考虑论文最初发表的时候，对于推进语文教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尽管在作者看来，当时

的观点未必成熟，所论还远非全面。这是需要理解的。

关于论文的取舍，我还要替《后期》编者说两句。诚如编者在《引论》的最后所写——当选编之初，他们就预计到：“为20世纪‘前期’编语文教育论集，难度在材料的收集；为20世纪‘后期’编语文教育论集，难度在材料的取舍。”尽管这部《后期》总规模出版社规定为百万字，但对于建国50年内发表的浩如烟海的中小学语文教学（还包括少量大学语文、中专语文）研究论文而言，依然是微乎其微。编者那种不免有“遗珠”之憾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也应当理解。

去年10月26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在天津举行第七届年会。这是换届会议，也是欢庆全国中语会成立20周年的盛会，我在离任前所作的《开幕词》中说了一段话：“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依我看，至关重要的至少有两条。一是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继承中求创新。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从孔夫子到叶圣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宝库。我们要尊重传统，科学地加以分析，吸取其中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发展当今语文教育的滋养。踢开传统，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二是正确处理自立与引进的关系。首先是自立，神州大地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有水平很高、论著丰富的语文教育家，有成效显著、风格各异的语文教改经验。我们并不贫穷，我们是富有的。对于自己的东西要充分加以重视，助其发展和推广。同时，又要把中国语文教学放在世界这个大视野里来观察，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看到这部《后期》即将出版，我对以上两点思考，

越加自信。

读者诸君，如能把《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的《前期》和《后期》都拿来置于案头，连起来翻读和查阅，一定能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了然于胸，并为我国语文教育研究代有新人而感到自豪。

2000年8月8日于北京寓次

引 论

李杏保 顾黄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诞生。为擘划新中国诞生以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同年9月，即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共同纲领》，在当时具有宪法的性质和权威，它的各项条款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理想。对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新中国的教育工作包括语文学科的建设和初步改革，就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大转折时期逐步推进的。

在回顾和分析新中国诞生前近50年中国语文学科建设发展的时候，我们曾经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语文学科独立设科阶段（1904—1912）、学科体系初建阶段（1912—1932）、曲折中探索前进阶段（1932—1949）。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语文学科

就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历程。

从1949年到1999年的这半个世纪，其历史发展的线索，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更新发展阶段、十年浩劫阶段和改革创新阶段。现分别简述如下：

（一）更新发展阶段（1949—1966）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中国语文学科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更新发展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中国人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战争环境转变为和平建设环境，从建立革命政权转变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从社会经济凋敝转变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振兴。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固然需要根本改造，国统区的进步教育思想和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宝贵经验，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予以更新和发展。就语文学科而言，具体体现在下面一些方面。

首先是为“语文”这一学科正名。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名称一直是“国语”和“国文”并存的：小学、初中基本上称“国语”，高中则称“国文”。这种状况自五四以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诞生的前夕（至今台湾、香港等地区仍都保留着“国语”、“国文”的学科名称）。1949年6月，全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为准备新中国诞生后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科书的编制，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讨论到语文这个学科的名称时，根据叶圣陶的提议，经委员会讨论后同意，把原来的“国语”和“国文”，不管小学还是中学，一律改称为“语文”。叶圣陶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语文”这一学科名称的确立，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学科的性质和任务有了新的更符合实际的认识。

其次是进行分科教学改革。1951年3月，中央教育部就开始提出语言和文学分科的设想，把“语文”分成汉语、文学两科分别进行教学。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给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强调语文学科必须实行语言和文学分科教学。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教育部便陆续制定了“初中汉语教学大纲”、“初中文学教学大纲”和“高中文学教学大纲”，随即根据上述教学大纲编辑出版了相应的课本。为了编好初中用的《汉语》课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持下，讨论拟定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使语言学界第一次取得了“求同存异”的共识，使初中汉语教学不致因语法体系的分歧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文学”课本，初中按文体、高中按文学史，各有系统地编排课文。这是我国语文教材编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分科改革尝试。可惜的是，这种尝试刚开始不久，终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教材本身的不成熟而在1957年中途夭折。这一改革尝试的利弊得失，将留待后人公正评判。

在教学方法的更新方面，影响较大的是1953年进行的关于《红领巾》观摩教学的讨论所引起的变化。195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在实习期间，举行了有关《红领巾》教学片断的观摩活动。参加观摩的除了实习学生、指导教师和北京市其他中学的语文教师外，还有前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普希金教授听过课后，在评议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改进教法的建议。同年5月27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根据普希金教授的建议，再次试教《红领巾》，压缩了教学时间，改进了教学方法，取得了初步成效。当年7月，北师大中文系语文教材教法专家叶苍岑教授发表了《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人民教育》在发表这篇论文的同时，还编发了题为《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这样，就引起了全国广大语文教师对改进语文课堂教学方法的普遍重视。对于《红领巾》教学法的是非功过，也得由后人加以评说。

经过 1958 年的“大跃进”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教育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事业必然要受到这样那样的挫伤。

60 年代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左倾错误逐步得到纠正，语文教学改革理论和实践开始有了健康发展的可能。首先，语文学科在中小学课程结构中的性质和地位得到确认。陆定一在《教学必须改革》一文中指出：“全日制中小学的最主要的课程，是语文（包括中文和外国文）和数学，这是学生所必需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同时明确，为了真正掌握好语文工具，就必须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和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简称“双基”）。1961 年后，语文教育界便正式提出了“加强双基”的口号。上海市还把“双基”的内容具体概括为字、词、句、篇、语（语法）、修（修辞）、逻（逻辑）、文（文学）八个字，称之为语文教学的“八字宪法”。

对于语文教学的更新和发展，在观念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两场大讨论。一场是有关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的讨论。上海《文汇报》从 1959 年 6 月 5 日起，开辟专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上海育才中学教师刘培坤写的《“文”与“道”——关于语文教学目的的任务的我见》。从 8 月中旬开始，讨论内容的范围逐渐扩大，以致形成了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范围最广、历时最久的一场社会性大讨论。讨论文章近百篇，持论各方态度认真，思维活跃，说理充分，充满了学术民主的空气。这就是现代语文教育史上著名的“文道之争”。1961 年 12 月 3 日，《文汇报》以《试论文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为题发表社论，对这场讨论作了初步总结，并把人们关注的焦点由文道之争引向“怎样教好语文课”的实际操作上来。这就是另一场大讨论。它是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大讨论的延续和必然发展。《人民教育》曾在 1961 年 8 月和 1963 年 1 月先后发表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刘松涛（署名“洛寒”）的文章：《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这两篇文章，标题不同，观点却一致：“语文是一种工具，要按照学习掌握工具的规律

进行教学，也就是说，要真正把语文课教成语文课。”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一度成了语文教育界克服片面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片面重视文学鉴赏两种倾向，真正落实语文“双基”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作用不可低估。

语文教学理论探讨的空前活跃和教学实践的有力推动，孕育产生了1963年5月教育部制订颁布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这两份教学大纲，可以说是建国十多年来语文学科更新发展阶段，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者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产物，是人们智慧的结晶。诚如有些语文教育专家指出的：1963年的教学大纲，比较正确地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明确了语文的工具性，提出了“文质兼美”的选材标准，规定要适当增加课文的数量，强调要多读多写、读写结合等等。这些都是自语文学科独立设科以来6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语文教育理论工作者和第一线执教老师经过不断探索而后获得的极其宝贵的结论，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十年浩劫阶段（1966—1976）

60年代中期，语文学科建设正开始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可是，1966年风云突变，“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使语文学科的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遭到严重扭曲。何况，语文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它与思想文化领域里众多的人和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条“黑线”，那个“黑帮”，总免不了要被牵扯到语文教学中来，以致语文学科受到“大批判”的冲击最猛，受到的创伤自然也就最重了。如果说文化教育工作是十年浩劫中的“重灾区”，那么语文学科教学自然属于“灾区”中的“重中之重”了。

首先是“政治挂帅”的语文教材。五四以来，包括开辟革命根据地以来，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统统被列入“另册”，被排斥在语文教材之外。现代文学方面，大概只剩了鲁迅一人被保留，并且因